政治科學論叢／第二十二期／民國 93 年 12 月／頁 31～66

全球化對亞太安全理念的衝擊與重建：理論的初探*

李文志**

摘　要

「全球化」從一九九〇年代起已成爲影響世局發展的關鍵性力量。「全球化」的趨勢也反映在亞太安全體系的變遷中；尤其是，因資本全球化而產生的一九九七「東亞金融危機」，以及因二〇〇一年「九一一事件」而衍生之全球反恐作戰，皆對亞太安全體系造成廣泛而深遠的影響。連帶地，長期主導亞太安全體系討論的主要理念－「共同安全」、「合作性安全」與「綜合性安全」也應予重新檢視，評估這些理念在「全球化」趨勢下的適用性及可能的修正，甚至，提出新安全理念的論述以因應「全球化」的發展與挑戰。本文即從省思「全球化」及其與亞太政經互動所蘊含之經濟與軍事的意義，作爲重構亞太安全理念的依憑，並據以提出「新綜合安全體系」來建構符合亞太獨特安全生態的觀點。

關鍵詞：全球化、區域化、共同安全、合作性安全、綜合性安全、東亞金融危機、九一一事件、新綜合安全體系

---

* 作者首先感謝兩位匿名審查者的費心審查及提供的寶貴意見，特此致謝；另外，作者也要感謝國家科學委員會對本文的研究獎助（NSC 92-2414-H-260-001），讓本文得以順利完成。本文初稿曾發表於民國 93 年 4 月 22～23 日「2004 年臺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淡江大學東南亞研究所、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暨東南亞研究所共同主辦。台北：淡江大學。

** 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副教授

收稿日期：93 年 7 月 26 日；通過日期：93 年 10 月 18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壹、前　言

依新現實主義者（neo-realist）的觀點，在一個本質上處於無政府狀態的國際社會裡，確保國家安全是國家在國際社會中最重要的政策（Waltz, 1979）。就實存的發展而言，國家安全的基本要求在確保人民的生命與財產，而涵蓋的範圍則相當廣闊，包括對基本維生之水、土地和重要天然資源的取得、分配與控管能力，防止敵人入侵與掠奪的能力，確保國民經濟與整體社會經營運作的能力及國家政治體制的維繫等，都屬於國家安全的基本目標與範圍；換言之，國家對安全概念的指涉與要求是豐富、複雜而多層面的。各國對國家安全概念及內涵的界定除表達主觀的價值與偏好外，也反映對客觀世界秩序、權力及利益結構安排的期待。這種融合國家主、客觀期盼的安全理念，將隨著各國所處時空環境及主、客觀利害關係的轉變而不同。當各國將其安全期待投射至國際層次時，必將企圖影響國際安全理念的形塑及主導安全體系的發展，而這也將影響國際安全理念及體系的內涵與運作。就臺灣當前所處的戰略環境而言，涵蓋臺灣主要安全威脅的中國及安全支持者美國的亞太[1]安全理念及體系的發展，最攸關臺灣的生存與發展，也是影響臺灣安全戰略設計的關鍵因素，故掌握及釐清亞太安全理念的發展，將是臺灣擬定安全戰略的重要基準。

從冷戰時代的圍堵與反圍堵、到冷戰後全球化風潮下所浮現各種亞太安全理念、體系與戰略生態的發展，都反映著全球及亞太權力結構的轉變及各國安全目標的實踐。對愈趨整合進全球化的東亞國家而言，在先後歷經因資本全球化而引爆的一九九七年金融危機及二〇〇一年「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以下簡稱「九一一事件」）而捲入全球的反恐作戰之中，如何釐清及界定全球與區域間極爲複雜的政經關係，不僅是重要的理論思考，更關係著東亞各國在全球化下如何競逐生存與發展的嚴肅課題。因

[1] 本文所稱亞太是指包括美、加、澳、紐及東亞等國，學界大都採用此一界定；而東亞地區則涵蓋東北亞的日本、南韓、北韓、東南亞十國及台灣與中國等東亞國家所在區域。亞太與東亞這兩個詞彙在文中討論將交錯使用，主要是依隨討論中所指涉對象及區域而定。

國家圖書館學術期刊資料庫

此，正視並適確詮釋及掌握東亞在全球化過程中的意含與地位，將使東亞國家更清楚理解全球化和區域發展的關係及影響，提出有效管控全球化衝擊與風險的論述及機制，強化東亞國家在全球生存競爭中的地位與策略（Olds *et al*., 1999）。

本文的目的就是希望在掌握全球與區域之間既競爭又合作關係的同時，也能廓清自一九九〇年代新一波全球化中所蘊含之經濟與軍事面向的互動關係，藉以檢視亞太當前主要安全理念的意含，以重建符合亞太主體需求的安全觀。因此，後文的論述將分成三個部分進行：首先是省思當前積極主張全球化者（Hyperglobalist）的論述，分析該論述中因過於強調全球化中的功能面向，而似乎不願也不易正視全球化與區域化（regionalization）的競合關係及其間的政經意含，作爲掌握亞太安全理念發展的憑藉；其次，分析多年來亞太地區所盛行安全理念的特質，並評估全球化對這些理念的衝擊與影響，作爲重建亞太安全理念的依據；最後，試著重新建構亞太安全理念的概念架構，以爲亞太國家因應全球化的策略架構。本文希望透過上述安排，能在全球化的新風潮下賦予亞太區域安全理念新的內容。

貳、全球化論述與全球化的省思

雖有學者（Castells, 2000）認爲這波全球化起自一九七〇年代開始的資訊年代（the information age）；但嚴格說，學界的全球化論述大約盛起於一九九〇年代初期，特別是隨著一九九三年「網際網路」的推展和一九九五年「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正式成立，才見風起雲湧。依據「社會科學指標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SSCI）系統，查知從一九八〇至八四年間只有 13 本書或論文處理有關「全球化」的主題，但到一九九二至九六年間相關篇數已快速成長至 581 篇，而且單只一九九六年就有 211 篇（Olds *et al*., 1999: 1）。換言之，有關討論全球化現象的文獻是起自冷戰結束後的一九九〇年代，並在一九九〇年代中期才成爲難以抗拒的趨勢。

有關全球化的論述迄今仍然對「何謂全球化」莫衷一是，這主要是因全球化的討論涉及諸多功能面向與範疇，而難有各家一致同意的界定，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如，論述範圍就涵蓋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心理、生態及國際關係等領域。不過，這些論述大抵還是有一可被共同理解及作爲討論的基礎，那就是涉及可擴至全球範圍而具「即時」（real time）－「同時性」（simultaneity）[2] 與功能整合（functional integration）的議題。這些功能面向包括具體可見的物質面，如通訊、資本、貨物與人力的流動等；以及不易被直接度量及表述的複雜性社會、政治體制及文化與心理的認知面等，如全球主義（globalism）、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及全球性（globality）等面向（Kudrle, 1999；Castells, 2000；Beck, 2000；Nash, 2004）。當下的全球化論述就是建立在這一可被共同接受的事實與理解上，讓討論因有共同指涉的全球空間及功能議題，而讓討論及爭議具有對話的可能性與意義。

在眾多有關有無全球化？何謂全球化？以及全球化的意義與影響爲何的爭議中，大致可依分析單位（unit of analysis）的界定及對世界觀（world view）想像的不同分成三大論述（Hoogvelt, 2001: 120-121）：

1. 肯定論者（Hyperglobalist）（Ohmae, 1990；Castells, 2000）以全球爲分析單位，強調全球化是市場經濟與資訊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這類觀點延續 Adam Smith 的自由主義（liberalism）主張世界貿易應自由往來，這一全球主義者（globalist）論述的主題集中在市場、通訊及直接觸及全球化的環境與生態等外部的性質（externality）（Kudrle, 1999: 3-23）；
2. 懷疑論者（Sceptics）（Hirst and Thompson, 2002）的論述可分爲兩派，一是以國家爲分析單位的現實主義者（realist），主張國家仍是國際社會的主要行爲者，全球化只是國際化的延續及另種表徵（Zysman, 1996），甚至國家的角色不但未被侵蝕（eclipse）還爲

[2] 全球一體化的「即時性」（Castells, 2000: 101）或稱「同時性」對全球化的建構及想像是極爲重要的概念，它讓時空得以壓縮至不特定人皆可被納入一共同經歷的過程，這就像 Benedict R. Anderson 在《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一書中所言，「同時性」（simultaneity）的建構及想像是許多從未謀面及互動的人得以跨越時空界線而「認同」爲同一民族共同體的重要因素。

臺灣人文社會學術期刊資料庫

因應全球化而更顯重要（Evans, 1997），二是將 K. Marx 的階級宰制分析擴展至資本主義發展的世界體系論（world-system theory），主張全球化早自十五世紀資本主義發展以來就一直進行著，這並非當代特有的現象，且隨著資本主義愈趨全球化還將更惡化當前的世界景象，如貧富差距（Wallerstein, 2001）；

3. 修正論者（Transformationalist）（Appadurai, 1990）強調國家雖仍是國際社會最主要的成員，但全球化確實對以國家爲主的國際社會造成新的斷裂與差異（disjunctures and differences），涵蓋領域則包括族群、國家、科技、金融、媒體、文化與意識等不同的面向，這導致大眾對新概念及新治理（governance）模式的強烈需求，以處理日愈複雜並超過傳統理論與統治模式所能應付的新情勢及新風險（Pierre, 2000: 1-6）。

上述有關全球化的論述，特別是「肯定論」者主要是以經濟、社會、生態及文化等功能議題作爲分析切入面，並直接串聯國家與市場兩個分析單位的功能關係，以支持全球化的論述。這一觀點主要的商榷在於：爲肯定全球化而過於偏向市場與社會（簡稱經社）的討論，而低估影響國際體系發展至劇之軍事課題的重要性，即使是一些重量級的國際關係學者在鋪陳冷戰後國際關係的發展時（Rosenau and Czempiel, 1998），也明顯忽視國家軍事與安全議題對全球化的影響，尤其是美國霸權全球軍事部署在其間的影響與重要性。相對地，一些專注討論區域主義發展或區域安全課題的論述，也因所持基本立場偏向「懷疑論」觀點，而未能有意義地將全球化的意含與影響擺進不同區域安全的討論中（Lake and Morgan, 1997）；抑或是，仍以制度需求與建構的觀點，鋪陳區域主義與「多邊主義」對建立區域安全制度的重要（Acharya, 2003），但問題是區域主義和全球主義都是「多邊主義」，故這一看法不足以區隔及突顯區域主義和全球主義的根本性差異。難道全球化對區域主義的發展除多邊制度的意含外，就已無其他重要的面向可資探究？事實上，即使是有「東協女士」（Ms. ASEAN）美譽的 Estrella D. Solidum 在討論東協（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區域主義發展的新作中，依然跳過全球化的討論，僅就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區域主義的觀點申論東協的發展（Solidum, 2003）。

上述有關全球化論述的商榷，顯示「肯定論」者若非假經社功能議題論證市場與國家在全球的關係，就是忽略全球霸權和介於全球與國家中介空間－地緣區域的重要性，更未重視軍事安全等面向與全球化發展的關係及影響，這導致「肯定論」者「天真」而抽象地化約掉全球霸權、地緣空間及涉及軍事安全之「硬性權力」（hard power）對全球化的影響。Immanuel Wallerstein 就主張這一承襲自由主義意識型態的論述，幾乎抽空區域空間－「地緣」文化差異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發展下的意義與影響，無視於資本主義全球化過程中被拋棄而極度落後的地區（Wallerstein, 2002: 19-66；171-185；Went, 2002）。同樣地，在有關區域主義的討論中，尤其是對安全議題的討論，也是無力在其中處理全球化的意義與影響，而未能將全球化適當地放入論述的架構中，分析全球化（特別是美國所強勢主導之全球化）對區域安全理念及體制的衝擊與影響；於是，在欠缺此一反省與思考下，有關區域自主性發展的論述也常有被誇大之嫌。

從歷史的發展來看，夾雜在全球化與區域化並行（parallel）發展的軍事與經濟力量，一直是影響國際體系發展的主軸；強權所主導的區域性經貿集團和全球戰略版圖的變動長期來即密切相關（蕭全政，2001）。從十七世紀西歐國家進行海外軍事與經濟殖民拓展以來，不同殖民勢力範圍的劃界、衝突與戰爭就和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擴張交錯發展著。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期，西方各主要殖民勢力集團化的惡性競爭，尤其是以英國爲主的「英鎊集團」、法國的「法朗集團」、德國的「關稅同盟」及日本組建的「大東亞共榮圈」等區域勢力的攻防，更直接造成一九二〇至三〇年代世界經濟的大恐慌及二次世界大戰。進入冷戰時代的美、蘇東西對抗，從地緣政治的視野來看，亦是以美國爲首的海洋勢力集團和以蘇聯爲主之歐亞大陸集團的軍經對抗（李文志，1997：38-44）。從一九八〇中期持續發展至今的世界經濟三大區域化－歐洲的「歐盟」（the European Union, EU）、北美的「北美自由貿易區」（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rea, NAFTA）及主要涵蓋東亞與北美的「亞太經濟合作會議」（the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nference, APEC），更是和美、蘇冷戰體系的瓦解、區域安全議題的興起（如波灣戰爭、巴爾幹半島種族戰爭、東亞地區的朝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鮮半島與台灣海峽的緊張關係等），以及「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成立重疊且並進的發展。[3]

在當代主張全球化的論述中，顯然未對軍事安全、區域化與全球化之間關連性予以足夠的重視及廓清其間複雜的連動性（Rosenau and Czempiel, 1998；Väyrynen, 1999；Castells, 2000: 110-116），進而未能將安全與地緣空間的意含精確地擺進全球化的論述架構中，讓同時蘊含市場經濟、軍事安全的區域化和全球化發展，也能反映彼此在現實世界中交錯的關係。事實上，從空間的發展景觀及資源的使用、配置和其中所蘊含的權力結構與利害關係（而不是僅就功能議題的深化程度來看），當前的全球化進程其實只是北美、歐洲與東亞三大經濟發展區域－「三極化」（triadization）的帶狀串聯，也就是當前世界經濟三大區塊的擴大及連接(Hirst and Thompson, 2002: 27-92；Went, 2002: 54-58）。相關數據清楚顯示，全球化幾乎就是三大區域「極化」（polarized）發展的擴張及延伸（Zysman, 1996；Hoogvelt, 2001: 67-93；Hirst and Thompson, 2002: 27-92）：

1. 全球對外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的資金流量，在一九九〇年代前半期已有 86% 流向僅占全球人口 30% 的三極區域；

---

[3] 當前盛起於 1990 年代中期之全球化風潮的最直接助力，無疑是 GATT「烏拉圭回合談判」的達成，而有效緩解從 1980 年代中期後世界經濟漸趨區域化的走勢。1987 年啓動的「烏拉圭回合談判」，因農業問題衝擊著各國傳統的生活模式及政治生態－選票結構，從一開始就面臨極大的挑戰而陷入談判困境。然而，在此同時世界經濟卻出現逐漸區域化的發展趨勢，先是歐體（European Community, EC）在 1986 年 3 月宣佈將於 1992 年成立單一市場；隨後，1993 年 11 月馬斯垂克條約正式生效，歐洲聯盟正式成立，而歐洲經濟區域（European Economic Area, EEA）也在 1994 年 1 月 1 日正式運作（Portes & Vines, 1998: 73-101）。其次，美國在 1989 年元月與加拿大共組自由貿易區，並於 1993 年擴及墨西哥後正式成立「北美自由貿易區」。此外，東亞也因上述趨勢，由澳洲和日本主導在 1989 年 11 月於坎培拉成立「亞太經濟合作會議」，且在 1991 年漢城會議中讓臺灣、香港與中國加入，使 APEC 運作略具雛形，並於 1992 年曼谷會議通過「1992 制度安排」宣言，將 APEC 的組織建制更往前推進（Funabashi, 1995: 73-78）。就在世界經濟逐漸區域集團化之際，美國成功操作「挾 NAFTA 以制 APEC，再挾 APEC 以制 EU」區域攻防戰略，而促成 GATT 的談判（Christopher, 1993）。1994「烏拉圭回合談判」終於以「逐年關稅化」方式達成農業談判及決議於 1995 年正式成立 WTO，讓世界貿易體制得在區域化的基礎上促進全球化的發展。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2. 以一九九六年的世界貿易總額而言，有近 78% 集中在三大區域，而落後地區的非工業國家只占 19%；
3. 一九九六年美、日（不含其他東亞國家）及歐盟（15）等國的國內生產毛額（GDP）即占全球的 50%，估計這些最富有的「核心」國家和最貧窮「邊陲」國家的所得比已從一九七三年的 44：1 擴大至一九九二年的 72：1，這些核心國家一年消耗全球近 70% 的能源、75% 的金屬、85% 的森林資源及 60% 的食物。

依「肯定論」的論述而言，地緣空間的差異性的確很難成爲以經社功能爲主題者的關注；因爲，在經社功能議題的討論中，功能中所隱含「波及或返退效應」（spill-over or back effect）的線性發展是可穿透「時空」差異而作一般性的討論。這導致「時空」可從特定社會的生活節奏抽離出來而放諸世界，並可不受限制地在世界各地進行社會活動的重組，將「時空」的內涵抽空並放大至全球的場域進行「全球化」（Giddens, 1990；Nash, 2004: 64-67）。這一論述邏輯常使區域的差異性、自主需求及影響被存而不論的化約，並將之轉換成全球與在地（the local）間的功能關係，而稱爲「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全球思考，在地行動」（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的發展。（Smith, 1995；Nash, 2004: 83-87）同樣地，軍事安全或戰爭的課題也因直接觸及國家主權的「高度政治」（high politics）場域，讓屬於強調經社性質的「軟性權力」（soft power）難以完全穿透及取代，而不被以經社議題論述全球化者所討論。

從現實的利害關係來看，「肯定論」可謂是典型新自由主義的觀點，意味強勢國家－特別是美國在全球所設定的功能議題必將穿透，甚至支配身處同一全球化進程的弱勢國家。對此一片面的論述，弱勢國家當然從政治謀略的角度，認定全球化根本是全球霸權所設計「高度政治性卻僞裝爲非政治（apolitical）」的陰謀（Beck, 2000: 160）；這也造成許多討論全球化的文獻，重蹈一九六〇至七〇年代有關「現代化理論」與「依賴理論」爭辯的覆轍，從各自立場爭辯支持或反對全球化，讓全球化的討論變成各自詮釋與信仰的狀況（Ohmae, 1990；Went, 2002；Wallerstein, 2001, 2002）。其中，支持全球化的論述幾乎就專注重於討論經濟、社會與民主等議題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延續、整合與變遷，並強調國際社會如何在全球化所引發的新趨勢下建構必備的新秩序、規範、制度及治理的模式（Rosenau and Czempiel, 1998；Väyrynen, 1999: 25-46；Pierre, 2000）。

然而，對許多未被捲入冷戰後「全球－區域化」（glo-regionalization）交錯發展的國家，特別是所謂的南方落後國家，如非洲國家更幾乎已被支持全球化論者所遺忘；而且，更慘的是，這些國家在全球化的深化過程中還比過去更加貧窮，甚至，有些國家還被歸爲處在基本維生邊緣之極度貧窮的「第四世界」（the fourth world）。很顯然，資本主義在發展過程中對不同區域所造成的掠奪、不公、衝突及戰爭，並未受到支持全球化者足夠的理論思考及在實踐上的關懷（Hirst and Thompson, 1996；Went, 2002）；其實，即使是有關經濟全球化課題中所展現的安全意含及影響，如一九九七年東亞金融危機中所寓藏對東亞國家與區域的安全問題，就未獲得主導解決金融危機之美國足夠的重視。當時，美國無視於東亞國家的國情特殊性及要求，堅持依其主導的國際貨幣基金會（IMF）模式－自由市場的邏輯進行重整，結果在許多國家造成慘重的社會安全危機，甚至在印尼還引發大規模的族裔（土著排華）仇殺事件。同樣地，二〇〇一年「九一一事件」發生後，美國也執意將東亞國家納入全球反恐作戰的部署中，這也連帶引發恐怖主義從全球衝擊到東亞而引發連串的恐怖攻擊事件，當然，這亦未獲得著重經社議題而大力主張全球化者的正視及討論（李文志，2002：9-12；Acharya, 2003: 329-348；Habito, 2004）。

總言之，作爲中介於全球與國家間之區域的地位及內涵，必須予以重新的認知並詮釋其和全球化的關聯性，而且，必須在國際政治經濟學的領域中另闢相關的研究議程與範疇，適切分析在全球化進程中「全球主義－區域主義－國家主義」三者間非常複雜且涵蓋政治、經濟、社會與軍事安全等多面向的互動關係與內涵（蕭全政等，1994：1-21；Park and Lee, 1999: 129-151；Higgot, 1999: 91-106；Sum, 1999: 129-145；Payne, 2000: 201-218；蕭全政，2001）。否則，各國如何從所處地緣區域的空間特質，思考全球化對特定區域經濟與軍事層面的衝擊、挑戰，以及因此所必須的因應策略及新治理模式。這些問題的思考與解決很難從現有的全球化論述中找到令人滿意的答案，故必須回到區域研究的領域中重新思考與建構。

臺灣博碩士學位論文期刊資料庫

參、亞太傳統安全理念的形成與發展

依亞太權力結構與安全體系的發展來看，近年來較被廣泛討論的安全理念主要有三：一是依據「歐洲安全暨合作會議」（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CSCE）的運作經驗而爲部份西方國家所推展的「共同安全」（common security）；二是亞太地區如加拿大和澳洲等「中權國家」（middle power）所積極提倡的「合作性安全」（cooperative security）；三是日本和部份東亞國家主張的「綜合性安全」（comprehensive security），當然，這些東亞國家彼此間對「綜合性安全」的方向、重點及內容也有著不同的強調與預期。基本上，這三種安全理念不僅代表不同國家對亞太安全體系發展的界定，更彰顯倡導國對自身國家安全的目標與企圖。

一、共同安全

「共同安全」一詞首見於一九八二年「帕姆委員會」（the Palme Commission）所提出之報告－共同性安全：生存的一個藍圖（Common Security: A Blueprint for Survival）。根據此報告，「共同安全」的主要內涵爲：避免戰爭是各國共同的責任，特別是核武戰爭；各國的國家安全及生存是相互依賴的；核戰的避免須仰賴各國對和平的堅持、國家的自制及降低軍備的競賽等（Dewitt, 1993: 10）。另外，該委員會也列出「共同安全」的六項基本原則：⑴各國家均有主張安全的合法權利；⑵武力不是解決國家爭端的合法手段；⑶國家的政策須以自制（restraint）爲著眼；⑷軍事優勢不一定能確保安全；⑸裁軍及軍備管制是必要的；⑹避免將軍備談判與政治事件聯結處理（Dewitt, 1993: 11；林正義，1998：8）。基本上，「共同安全」的內涵接近「防禦性安全」（defensive security）與「集體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的精神，希望透過共同的合作途徑，降低戰爭的可能性，而非採取強硬對抗的軍事同盟或雙邊的協防條約來阻止戰爭。其所指涉的範圍相當廣泛，包括與敵人合作、強調經濟與環境安全的重要性，以及促進各國進行裁軍、軍備管制與推動建立「信心暨安全建立措施」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confidence and security-building measures, CSBMs）等（Dewitt, 1993: 22）。

在亞太地區率先鼓吹推動「共同安全」理念的是蘇聯，一九八六年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在「新思惟」的外交方針下，提議亞洲國家參照「赫爾辛基會議」（Helsinki Conference）的運作模式及成果召開太平洋會議（Pacific Ocean Conference）。蘇聯此議深獲澳洲及紐西蘭的支持，希望藉由在亞太成立新的安全架構，而將「共同安全」中的反核武政策推展於亞太地區；隨後，澳洲外交部長伊文斯（Gareth Evans）在一九九〇年呼籲各國在亞太地區成立「亞洲安全暨合作會議」（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Asia）（Dewitt, 1993: 24；林正義，1998：10）。然而，澳洲的倡議卻爲美國和東南亞國家所反對，美國的憂慮是其假雙邊安全體制主導亞太安全體系的影響力，將因新區域多邊安全組織的成立而被稀釋；相對地，東協則擔心西方國家將藉「共同安全」的相關機制施壓東亞國家，特別是干預各國的內政如人權問題，遂反對將「歐洲安全暨合作會議」的版本移植到亞太地區。不過，隨著冷戰結束，東協國家因在形式上逐步取得主導亞太多邊安全論壇的發展，即「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 ARF），故也漸接納「共同安全」核心理念的「信心暨安全建立措施」。美國也因蘇聯的瓦解及多數亞太國家的支持，而不再反對在亞太設立多邊的區域安全論壇；當然，美國亦在一九九一年發佈以雙邊安全體制爲主軸的「扇形戰略」（Baker, 1991），並在一九九六年確立美日新安保體制，藉以鞏固其在亞太安全體系中的主導地位。

二、合作性安全

「合作性安全」是加拿大前外長克拉克（Joe Clark）在一九九〇年九月聯合國大會中所提出，相對於從「歐洲安全暨合作會議」所衍生之「共同安全」，「合作性安全」在推動建構亞太安全保障體系時，更強調在沒有特定藍圖、計畫與組織下，以非正式途徑、彈性漸進及結果取向逐步地架建亞太安保體系。在理念落實的過程中，「合作性安全」比「共同安全」更強調如下重點：⑴在形式要求上更寬鬆與彈性，不必然須有聯盟集團的

臺灣博碩士學術期刊資料庫

對峙、集體安全或是以正式的組織、條約的方式，來確保相互的安全承諾；⑵在安保機制的啓動時程上，更著重預防危機的出現而非事後的處理；⑶不排斥區域內現有的相關安全安排與協定，務實漸進地發展多邊安保機制，設法將現有的區域（正式與非正式）安全機制整合進新的安保體系中；⑷尊重國家利益仍爲各國的首要考量，不論強弱國都是達成區域安全的重要成員（Dewitt, 1993: 14；林正義，1998：11；Acharay, 2003: 33-34）。當然，「合作性安全」也和「共同安全」一樣，都主張必須與潛在的敵人一起合作來達成安全的目標，此外，兩者也都隱含一些「綜合性安全」的看法，嘗試將安全的定義擴大至非軍事性的層面，不過，軍事問題的協商與合作依然是「合作性安全」的主要關注。

從「合作性安全」理念在亞太地區推動的過程來看，「合作性安全」和「共同安全」的最大不同是對非正式途徑的重視，亦即，在強調建立安全對話習慣與管道的核心精神下，只要能促進亞太區域安全體系的穩定發展，任何形式的安排都應積極加以促成。這一務實的理念讓「第二軌」（the second track）的協商模式在落實「合作性安全」時扮演重要的角色，也就是由非官方的學界、民間團體及以私人身分出席的政府代表，透過非正式的機制共同協商亞太安全問題（蕭全政、李文志，1999：388-394）。進一步從具體的措施來看，「合作性安全」主張的是在接觸的過程中逐步建立相互的信任，而互信的關鍵就是軍事政策的透明化與公開化。依「合作性安全」理念所推展的「第二軌」外交會議，主要的討論內容也大都集中在有關「信心暨安全建立措施」的項目：定期出版國防政策報告書，表明各國的國防預算與國防目標、意圖和計劃；儘可能地流通區域內的軍事情報與資訊，避免不必要的軍事猜忌；制度化區域內安全對話的機制，如定期的區域安全會議，以調解區域內可能的軍事衝突；架設一套危機處理的安全機制，有效排除可能發生的安全危機；發展武器買賣登記制度，全面掌握武器交易的內容與流向。

三、綜合性安全

從政治、軍事、經濟與社會等面向整體地賦予國家安全的觀點是較符合東亞國家的需求；因爲，對大部分的東亞國家而言，歷經殖民統治、美、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蘇冷戰對抗與各國內部戰亂等慘痛的歷史經驗，使其在界定國家與國際安全的內涵時，乃提出偏重自身內部政治、經濟與社會需求的「綜合性安全」（Dewitt, 1993: 5-6）。雖然，此一強調多重面向與國家經社安全的安全觀點，在軍事武力主導國家安全理念的冷戰時代中，並未受到西方主流國際關係論述的重視。然而，隨著冷戰的結束，因軟性權力所蘊含的安全內涵，已對國際關係的發展產生愈趨明顯的影響力；亦即，在一個全球互賴日深與政經連動增強的國際社會中，國家的安全威脅不僅更爲多面且複雜，國家維繫安全的能力也日益受到限制（Keohane & Nye, 1977；Nye, 1990）。這說明跳脫軍事思惟的片面性，改以綜合性的政策思考來建構國家的安全環境，漸爲後冷戰時代國家安全的新關懷（李文志，1996：59-61；Vodanovich, 1997: 17-18；劉復國，1999：30），也使得原爲東亞國家所主張的「綜合性安全」理念漸爲世界各國所重視。

「綜合性安全」在亞太地區的發展可分成兩個脈絡：一是強調「外導取向」（outward-looking）的日本，另一則是主張「內導取向」（inward-looking）的東協國家，兩者分別代表經濟先進國與後進國面臨的安全情境及解決方法。其中，日本的國家安全目標因國內族群同質性高及政治結構穩定，乃將安全焦點凝聚於外在的環境，特別是如何確保日本石油及經貿生命線的安全；相對地，大多數東協國家因國內種族複雜、政治不穩定與社經發展落後及貧富不均，而導致國家社會動盪不安，故安全政策大都強調如何發展國內經濟、維護政治與社會安定及排解種族紛爭等課題（Dewitt, 1993: 8；劉復國，1999：30）。就相關安全理念的比較而言，「綜合性安全」對大部分的東亞國家是較具吸引力；因爲，對缺乏區域安全合作經驗與條件的東亞國家，以強調發展經濟、滿足各國內政需要的安全理念作訴求，除可增強各國參與建構區域安全保障體制的動機外；更可突顯安全合作對區域經濟發展與整合的貢獻，從而提升經濟弱勢國家對亞太「共同安全」的認同，縮減各國因經濟發展程度及文化背景不同而產生的立場差異。因此，在作爲亞太安全論壇體系中最重要的「第二軌」機制－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Council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CSCAP）中，就設有「綜合性暨合作性安全工作小組」專責探討東亞國家所強調之「非軍事」因素對亞太安全的意義與影響。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四、「合作性安全」的實踐與限制

從歐洲集體安全發展的經驗看來，亞太地區無論在歷史文化背景、區域權力結構、各國政經發展程度、軍力結構特質等安全環境的基本特質與條件，都明顯與歐洲的安全經驗不同；因此，由歐洲安全環境所發展出的「共同安全」－集體安全體制，仍不可能完全移植及適用於亞太地區（Harrison & Prestowitz, 1990: 62-67；Fisher, 1991；Evans, 1995）。亞太地區獨特的政經生態與安全環境，雖然使亞太各國難以依循人類現有的知識與經驗，規劃出整套立即可行的區域安全保障體制；但是，亞太地區卻也因爲這種獨特性，促使區域內的國家必須發揮更具可能性的理論觀點與政策思考，方能爲冷戰後的亞太地區搭建新的安全架構，以確保區域的和平、穩定與經濟發展。

冷戰結束後，如何建構亞太多邊安全合作體制的文獻即大量湧現，亞太第一個正式的官方多邊安全論壇，ARF 也隨之在一九九四年七月由東協推動成立。依「合作性安全」內涵來看，其所揭櫫彈性程序、過程開放與反覆磋商的特性，顯然和東協本身所強調「東協模式」（ASEAN way），即整合「共識決」與「第二軌外交」的傳統決策模式非常近似；因此，在 ARF 的成立及發展過程中，「合作性安全」即不斷被提及與討論其對亞太區域安全體系發展的貢獻。當然，「共同安全」所鋪陳的安全理念與體制設計，也予 ARF 的發展相當的啓示。其實，若以西方國家所偏好的安全理念來看，ARF 可謂是結合「共同安全」與「合作性安全」的基本精神，並試圖從三個面向來化解亞太各國間的爭議，以建構亞太多邊安全合作體制：⑴透過突顯亞太各國安全利害與共及互賴的關係，跨越亞太區域內歷史文化與地緣上的差異性；⑵迴避誰是亞太地區主要安全威脅者的敏感問題，讓中國此一新興強權和舊有勢力及其他東亞國家，都願意參與區域的安全合作體制；⑶具體化亞太多邊安全體制的內容，以偏重軍事性的「信心暨安全建立措施」的制式政策，解決亞太區域內新、舊安全體制銜接的難題（李文志，1996：58；林正義，1998：11-14；Solidum, 1999）。

換言之，ARF 是希望在無共同敵人或假想敵情況下，亞太各國可以在共同安全與利益的基礎上，藉由「合作性安全」所強調協商及透明化國防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政策與軍事的交流中，增強參與國之間相互的信任與安全感，有助於緩和及避免東亞國家間的敵對與衝突（Yuen, 1997: 335-337；Solidum, 2003: 203-207）。的確，就實踐的手段而言，「合作性安全」的主張確實可暫時迴避建構如「共同安全」中所指陳「集體安全」機制而可能引爆的爭議。雖然，相對於比較強調應建構特定制度形式的「共同安全」，從程序與過程切入的「合作性安全」是現行在討論亞太多邊安全文獻裡，最常被提出及比較具有創意的概念。然而，「合作性安全」是否就真能完全滿足及適用於亞太地區？從政策的建構來看，「合作性安全」的核心主張仍偏向西方國家所偏向狹義的安全觀，即強調的是如何營建各方在軍事武器上的透明與相互信任，而互信的重點就是透過各種可能的交流及協商讓軍事政策透明化和公開化；特別是，因各國實施「信心暨安全建立措施」而得事先防範可能的安全危機與軍事衝突。

其實，就國防軍力處於相對（美國）弱勢的東亞國家，尤其是對中國、北韓及部分東協國家而言，依循「合作性安全」建構亞太多邊安全合作機制，似乎是將自身的國防發展嵌入由美國主控亞太的安全體制中。如此一來，中國與部分東協國家將產生疑慮，即在美國主導的安全規則下發展國防與軍事行動，而使其國家安全受制於美國界定的安全理念及體制。而且，對傳統上強調經濟發展、國內事務對國家安全重要性－「綜合性安全」的東亞國家而言，著重國防政策透明化與軍事合作的「合作性安全」概念，也未能從更宏觀與整體的層次統合經濟發展、國內安全與國家－區域安全間的關聯性，而難以滿足東亞國家對自身國家安全的需要。

很顯然，依據「共同安全」及「合作性安全」所建立的 ARF，目前是難以滿足大部分東亞國家所偏向「綜合性安全」的需求；尤其是，未能突顯經濟發展對東亞國家安全的重要性（Dewitt, 1993: 5-17；Hernandez, 1995: 4-6；Solidum, 2003: 210-211）；而這一重點在一九九七年「東亞金融風暴」後更見其對東亞國家捍衛國家安全的迫切與重要性。無疑，現階段強調程序與過程的「合作性安全」，無法從積極面滿足大部分東亞國家對經濟與社會安全的需求；甚至，就以亞太存在已久的潛在安全衝突，如北韓核武發展、台灣海峽衝突及南海領土爭議等，幾乎都無法因「合作性安全」機制的啓動就能解決。更何況，二〇〇一年的「九一一事件」後，美國這一

臺灣博碩士學術期刊資料庫

超級霸權將東亞國家帶進全球反恐作戰體系後，將對既有亞太區域安全機制造成何種衝擊與影響，也有待進一步的探究與評估。因爲，強調國防資訊的透明、公開及協商過程重要性的「合作性安全」，難以因應及滿足反恐作戰的需求；而且，反恐作戰將對區域經濟及各國內部的安全造成怎樣的衝擊與影響，也必須作更精確的探討，而這其間涉及基本立場與實質問題的解決，也不是強調程序功能面向之「合作性安全」所能處理。

表 1　亞太傳統安全理念之比較

	共同安全	合作性安全	綜合性安全
提出背景	首見歐安會議於一九八二年「帕姆委員會」所提報告，希望以避戰是共同責任的理念遏止美、蘇冷戰進一步惡化而可能導致的核戰。	加拿大外長在一九九〇年九月聯合國大會提出，有意仿歐安會議的「共同安全」概念，以解決冷戰後的亞太安全問題。	主要提出者是東亞國家，包括剛歷經殖民統治獨立的東南亞國家及歷經一九七〇年代石油危機的日本。
理念主旨	各國藉由正式的合作途徑共同降低戰爭的可能性，而非以強硬對抗的軍事同盟或雙邊協防條約來阻止戰爭。	特別強調非正式途徑，尤其是在沒有特定藍圖、計畫與組織下，以非正式的途徑、彈性漸進及結果取向的作法逐步建構亞太的安全體系。	從政治、軍事、經濟、社會與種族等面向賦予安全的內涵，但又區分爲強調外在經濟安全需求的日本觀點及重視國內穩定發展的東南亞安全觀點。
具體作法	強調合作方案的推動，尤其如何與敵人建立合作管道以降低軍備競賽，如促進各國進行裁軍、軍備管制與推動建立「信心暨安全建立措施」等。	著重程序與過程，特別是不需以正式組織或條約確保安全承諾，而是設法將現有正式與非正式的安全機制都整合進新安全體系，建立起「多軌」並存的區域安全體系。	對東南亞國家而言是如何發展國內經濟、維護政治與社會安定及排除種族紛爭，對日本則是如何確保石油及經貿生線的安全，以確保經濟發展。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共同安全	合作性安全	綜合性安全
推展成效	一九八六年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在亞太率先推動，但未被美國及東南亞國家接受，冷戰後美國雖不反對但卻須建立在其雙邊協防體制的基礎上，而東南亞國家則認爲正式的區域安保機制須由其主導，故離歐安會議所揭櫫「共同安全」的理想仍遠。	「合作性安全」提出後，成立於一九九四年的 ARF 是此概念的具體實踐，也是亞太安保體系的重要里程，但因其核心意旨仍偏向以軍力爲主狹義安全觀且因主事的東協並無力平衡美、中兩強，使其成效有限，而且 ARF 也無力達成東協所偏愛的「綜合性安全」，如解決一九九七金融危機衍生的安全問題。	冷戰後擴大傳統安全涵至「綜合性安全」或「人類安全」的觀點，已是大多數國家的共識但在東亞國家仍無法主導區域安全下，強調政經展與社會及種族和諧的安全觀並未被視爲爲亞太安全的主要目標，強權主導的亞太安全體系仍以狹義的軍事安全爲主。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肆、全球化對亞太傳統安全理念的衝擊與重建

從全球與區域複雜的交錯關係看冷戰後亞太安全體系的發展，可知在美國柯林頓（Bill Clinton）總統上台後強勢主導的全球化進程中，先後有兩個重大事件對東亞地區的安全體系造成極大的震撼與影響：一是經濟上的一九九七年東亞金融危機，這讓東亞國家在全球化中飽受全球化風險的摧殘，並企圖藉重組東亞區域主義的機制以牽制美國及國際貨幣基金會（IMF）的作爲，維護東亞自身的經濟與社會安全；二是軍事上的二〇〇一年「九一一事件」，這迫使全球隨著美國反恐作戰部署而進入恐怖主義全球化的新場域，而東亞國家在被迫捲入全球反恐作戰的同時，也面臨恐怖主義的攻擊。基本上，這兩大事件都對東亞地區既存的政治、經濟及安全戰略體系造成極大的衝擊；而更重要的是，這些事件也予東亞長期來已發展的安全理念深遠的影響。後文即就相關影響與意義進行討論，以便將全球化的相關意涵納入亞太安全理念的新建中。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一九九七年東亞金融危機的安全意含

伴隨經濟全球化而來的全球性金融風險與危機，終於在一九九七年於東亞地區引爆。[4] 一九九七年的東亞金融危機雖直接肇因於資金的全球自由流動，但仍有屬於區域內部結構性因素的促發，故必須從東亞地區特殊的經濟發展結構來掌握；此外，金融危機也對東亞國家造成政治、經濟及社會的動盪與暴亂，而對東亞國家的安全造成極大的威脅，甚至改變東亞地區政既有的政經權力結構。這些變化與影響都不是僅從市場觀點支持全球化論者所能評論及想像。

從東亞經濟發展模式與結構而言，中國從一九八〇年代末期竄起爲全球最大的新興生產基地後，爲消除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衝擊和持續擴展出口競爭力，乃於一九九四年將人民幣貶值近 1/2。這連帶影響深受一九九一年起泡沫經濟之害的日本爲維護出口部門的經濟，也隨之在隔年將日圓貶值近四成。中、日兩國匯率競貶的出口戰爭，直接壓縮東亞其他和兩國競逐出口市場的國家，尤其是東南亞國家及南韓，但是，這些國家爲持續經濟擴張的路線及取得必要的資金，乃採釘住美元匯率而高估本國貨幣的政策（Rosenberger, 1997: 223-251；Corbett and Vines, 1999: 155-177）。高估的貨幣政策除更削弱東南亞國家和中、日的出口競爭力外，也引進大量流竄於全球的投機熱錢，終於使泰國在短期高成本資金還債高峰到來之際先行引爆金融危機。換言之，經濟全球化不但未促進全球經濟更加繁榮而稍減各國經濟競爭的激烈程度，反而更增各國爲競逐全球高速流動資金的成本，並造成更大的經濟衰退與危機。當然，對趁著東亞經濟危機而大撿便宜而進行兼併的跨國公司而言，經濟全球化絕對是必然且應然的發展趨勢；這就是美國堅持須以自由市場邏輯爲前提，才願提供貸款解決金融危機的主因吧！

相對於美國藉機強化東亞經濟的全球化，東亞國家則在金融危機後亟於處理各國內部接連爆發的政治、經濟及社會的動蕩與暴亂。事實上，許

[4] 在此之前雖有 1994 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但因其規模、引發的連瑣效應及風險評估都遠不如 1997 年發生於東亞地區的金融危機，故冷戰後因經濟全球化所引爆第一次全球重大金融危機事件即在東亞地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多東亞國家長期來對國家安全的界定是「內導取向」的「綜合性安全」，而金融危機即對這些國家的內政造成極大的衝擊與危機。其中，印尼經濟的嚴重衰退不但引爆社會的脫序及種族暴動，使得華人陷於許久未見的慘烈遭遇；更讓國家瀰漫在軍事政變的陰影下，並導致執政三十幾年的蘇哈托總統（President Suharto）下臺，也讓印尼動蕩不安的政局延續至二〇〇〇年的總統大選。其次，馬來西亞也因對處理金融危機政策路線的差異，造成偏向美國方案的副總理安華（Anwar Ibrahim），遭到總理馬哈迪（Mahathir Mohamad）以違反諸多回教規律爲名起訴而遭罷黜(Park and Lee, 1999: 139），並引發內部多年未見的嚴重政爭及華人社會的緊張；甚至，美國還試圖打破東南亞國家極爲重視的「不干涉內政」原則介入馬國內爭，而於一九九八年 APEC 吉隆坡會議上由代柯林頓出席的副總統發言支持安華。另外，在金融危機中受創甚深的泰國與南韓，也在國內暴發許多強烈的抗爭與暴動。東亞國家所強調經濟發展、種族和諧、社會安全、政治秩序重要性的「綜合性安全」，在一九九七年金融危機中再次突顯對這些國家的重要性（Ding, 1998）。只是，這些東亞國家的特殊需求，顯然不爲著眼推動全球市場自由化的美國所關注。

美國爲貫徹東亞市場的自由化與全球化程度，不但不接受東亞國家爲因應個別差異而提出的方案；更在多邊協調機制上，排除東亞國家所期待以 ASEAN 或 APEC 區域協調機制挽救危機的做法，強行以美國主導 IMF 的貸款機制來壟斷紓解危機的管道，即使連日本提議協助解決的方案[5] 也不爲美國採納（Park and Lee, 1999: 142-145）。面對美國不顧東亞國家政治、經濟及社會需求的強烈作法，東亞國家－尤其是東協隨即在一九九八年成立「東協加三－中國、南韓與日本」非正式高峰會，討論東亞國家如何協力解決金融危機；稍後，中國[6] 在二〇〇〇年十一月的第三屆高峰會

[5] 其實，日本是亟於藉插手東亞金融危機來擴增出口以免惡化 1990 年代起之泡沫經濟，日本除提議自行提撥 300 億美元作各國貸款維繫匯率之用，也表明願由其帶頭籌資 500 億美元組成「亞圓圈」協助穩定區域的中長期匯兌之用。然而，事實卻是日本在提議解決東亞危機的同時，也讓日圓匯率貶值而直接擠壓其他東亞國家的出口，更形惡化相關國家的金融情勢；而且，日本提供的貸款還須以低率貸款取得，甚至還以購買日本貨品爲貸款的條件。

[6] 中國在東亞金融危機爆發後採行的重要策略包括：(1)在金融風暴期間力挺人民幣的幣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中，更提議將「東協加三」正式化爲「東亞論壇」，並建議成立「東亞自由貿易區」或與東協先共組「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希望藉由強化東亞區域內的經貿往來而減緩全球化衍生的風險與衝擊（中國時報，2000/11/26，3 版；陳鴻瑜，2000）。中國的作法顯然在藉拉攏東協來強化其在東亞的領導地位，以排擠日本在東亞的經濟領導地位及增加和美國所主張「全球－亞太主義」折衝的籌碼（Lee, 2001: 65-66；Stubbs, 2002）。從東亞戰略態勢與權力版圖的攻防來看，一九九七年的東亞金融風暴給予中國趁機勝出日本的絕佳機會，而中國也掌握此一時機而順勢竄起爲東亞新興的次霸權；自然，這也更壓縮台灣在東亞的安全與外交空間。

對在金融危機中受創的東亞國家而言，這次危機除顯示國內問題深受國際事務的牽制與影響，尤其是在全球化趨勢下，國內、外問題愈趨密切的關聯發展，確實已很難將兩者完全區隔處理；因此，在區域層次上，東亞國家也試圖建構新的機制因應因全球化所衍生的新風險。其實，面對以東亞國家爲發展主體的區域主義，美國如能有系統地將全球經濟發展、風險及各國內政及軍事安全整合鋪陳，而強調經濟、政治、社會若要穩定發展就必須同時處理全球和區域的風險及安全問題，當更能讓東亞國家在強化東亞區域主義的同時，也願與美國等其他西方國家在全球與東亞間共同搭建經濟與安全合作的體制。事實上，這種將經濟發展與國內事務提升至國家及國際安全層次的觀點，從一九七〇年代中期起，就先後爲日本與東協所延用，名稱雖有不同但可統稱爲「綜合性安全」。只是，在冷戰時代以軍事安全爲主的戰略架構下，東亞國家所提出偏向經濟發展、國內政治、社會穩定的「綜合性安全」，並未受到以西方立場爲主流之安全理論應有的重視（李文志，1996：74-77；劉復國，1999：22-23）。

簡言之，歷經諸如一九九七年「東亞金融危機」、二〇〇一年「九一

值及協助穩定港幣的匯率，避免已受創的東亞幣值發生第二波的「競貶」效應，這明顯不同於日本還刻意讓日幣貶值以搶佔其他東亞國家出口市場的做法；⑵除直接撥款數十億美元無償援助東南亞國家外，也提供低利貸款與東南亞國家的企業，這也不同於日本企圖以低利貸款或須購買日本貨品爲貸款條件的援助政策；⑶中國在 1998 年排除美國等西方勢力參與而以東亞國家爲主的「東協加三－中國、南韓及日本」會議中，採取與東協國家積極合作的立場，透過中國與東協先行提出「東協與中國自由貿易區」的策略，迫使日本也採取偏向東南亞國家的立場，藉以增加和美國勢力折衝的籌碼。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事件」及二〇〇二年十月的印尼「巴里島爆炸事件」的東亞國家，面對美國依全球化（經濟全球化、全球反恐作戰）所倡議建構的新安全體制時，如何能將其所重視的經濟發展、政治及社會穩定、族群與宗教和諧的安全觀也融入其間，不僅攸關東亞國家是否積極加入美國亟於建構的新全球與區域安全體系，也關係著美國能否有效確保自身的國家安全。

二、二〇〇一年「九一一事件」的衝擊與影響

從全球化的角度看「九一一事件」，主要意義是恐怖主義組織跨越國家領域而遊走於全球各地，使恐怖攻擊穿透特定國家的主權界限而對全球、區域或國家產生極大的恐怖意象，包括個體的人身安全、國家的政治、社會與經濟安定，甚至可能引發全球性（族群、宗教與文明）的軍事衝突，這使得國家及國際安全的意涵更加擴大及複雜化。「九一一事件」後，美國不僅在國內成立「國土安全部」（The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專責國內的反恐安全事務，將國土安全提昇至國家安全的最高層次（Hoffman, 2002）；另外，美國主導的全球反恐聯盟也企圖將全球－區域（亞太）－國家安全整合成單一的安全防禦及打擊體系，進行包括政治、經濟、社會與軍事的全面反恐作戰（Baviera, 2004）。甚至，從西方（民主）與反西方（非民主）「文明衝突」的觀點來看（Huntington, 1993, 1996），美國小布希總統除在「九一一事件」發生不久即脫口而出「文明的衝突」外，也在稍後繼攻打回教的阿富汗後，在二〇〇二年的「國情諮文」中將伊拉克、伊朗另兩個回教國家視爲推動恐怖主義的「邪惡軸心」，導致反恐作戰的安全意義提昇至打擊反西方（美國）文明的層次，也使得捍衛西方文明與民主政體成爲「九一一事件」後反恐作戰的重要目標（李文志，2002：10-14）。

從「九一一事件」中所引申之安全意涵與實踐來看，強調無共同敵人及程序公開透明的「合作性安全」，顯然不論在安全的實質內涵及實踐的程序與方法上，都難以處理因「九一一事件」所引發修正傳統安全概念的強烈企求，以及隨之而在全球反恐作戰實務層面的需求。事實上，強調統合國內、外事務及廣義安全內涵的「綜合性安全」，在美國強力主導反恐作戰全球化的年代裡，反而比較符合實際情勢的需要。相對於偏重軍事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全及程序民主的「共同性安全」及「合作性安全」，「綜合性安全」的目標指涉顯然更符合安全理論發展及滿足美國在實務上的需要：

1. 強調政治穩定、社會安定、族群和諧、經濟發展及國內治安對國家及國際安全重要性的主張，的確比較順應當前打破國內、外界限及全面反恐作戰的國家安全觀，尤其在「九一一事件」後，因全球反恐作戰的需要及各國重視國土內部安全的看法，乃更突顯「綜合性安全」的現實性及其在實踐上的意義；
2. 「九一一事件」中所彰顯非民主極權國家支持恐怖組織而危害國際安全的發展，強化美國長期來即積極主張之「政治民主化」對國際及各國安全的正當性，甚至，對美國而言，反西方民主及文明的國家就是啓動危害世界安全的主要軸心。

恐怖主義全球化所彰顯「政治民主化」對全球反恐作戰、防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的重要性，無疑爲美國積極推動的全球化進程，廣開另一重要的理論意涵與實踐的可能性；的確，恐怖主義讓政治民主化成爲全球化論述中的重要關注。雖然，延續自一九七〇年代以來的「第三波民主化」（Huntington, 1991）的發展，本來就是冷戰後美國所亟於推動的國際戰略；其中，如何「鞏固第三波民主化」（consolidate the third wave democracies）更一直是以美國爲首之西方民主國家的重點外交政策。美國打敗共產主義而贏得冷戰後，爲進一步鞏固以其爲首之西方民主國家的全球統治地位，乃大力鋪陳民主外交對國際安全的重要性。[7]「九一一事件」後更強化「政治民主化」對國際及各國安全的重要性，也讓過去在東亞未被重視之「政治民主化」對安全重要性的觀點得以被正視與思考。這也使得「綜合性安全」的概念在「九一一事件」後有了更豐富的民主意含；當然，也意味傳統上東亞國家所偏重經濟發展與國內特殊政治及社會需求，

---

[7] 美國的重要戰略學者與「策士」Samuel F. Huntington 強調根據實證研究，顯示民主政權因尊重人權、政府權力有限及折衝妥協的理性決策模式，故較不易發動戰爭；而且，統計上也顯示民主國家間幾乎是不發生戰爭，依調查從 1819 年至當代死亡人數超過一千人的戰爭共有 353 場，其中 155 場發生在民主與非民主國家間，而 198 場則爆發在非民主國家間，即稍具規模的戰爭未曾發生在民主國家之間（Huntington, 1995）。

淡江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但卻忽略「政治民主化」對國際及國家安全重要性的看法必須修正。

三、亞太安全新理念的初步建構－「新綜合安全體系」

一九九七年的「東亞金融危機」突顯原爲西方國家偏愛的「共同安全」或「合作性安全」難以滿足東亞國家在現實上的需要，尤其是對經濟發展、國內政治及社會和平與穩定的企求。二〇〇一年的「九一一事件」更表露「全球化」的恐怖主義對國家及國際安全的威脅，遠遠超越國際間傳統對安全的界定及想像，使得國土內部安全及國家體制的「政治民主化」必須融入全球及區域安全理念及體系的建構。這顯示亞太地區傳統的主流安全理念，包括偏重「軍事」與「程序」面向的「共同安全」、「合作性安全」，以及東亞國家所強調「非軍事」但卻忽略「經濟全球化」與「政治民主化」重要性的「綜合性安全」，都難以完整地涵蓋安全理念在現實上的需要。當然，這些現有的安全理念也都未能賦予東亞國家於「東亞金融危機」與「九一一事件」後，在全球及亞太安全體系中應有的角色與功能。

冷戰後的國際與國家安全的理念，在「後東亞金融危機」及「後九一一事件」之國際安全體系的新發展下；特別是，爲健全市場經濟、降低金融風險和全球反恐作戰的需要，以及防止非民主國家對國際及民主國家安全的威脅，亞太各國顯然必須在現有以「合作性安全」爲主的程序架構下，除在既有「綜合性安全」中擴增跨國經濟協調與合作以監視全球化的風險外，更須將「政治民主化」也納入安全理念與實踐中。在許多探討「東亞金融危機」發生的文獻中，也一再申論東亞國家政商之間的「恩庇－裙帶」（patron-client）關係亦是導致金融爆發危機的一大原因，如印尼、泰國與南韓等國。換言之，「政治民主化」所導向的金融體系透明化及市場自由化，將有助於削減全球化下金融危機的發生，當然，也更能提升東亞國家自身所偏愛的「綜合性安全」。

早在冷戰結束初期，美國總統柯林頓上台後在其「從圍堵到擴展」（from containment to enlargement）戰略設計中，就已明定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三大支柱就是：復甦美國經濟、擴展民主體制及強化國際安全（Lake, 1993；Clinton, 1993），基本上，美國這一迄今未變的國家安全內涵，幾乎就是反映當前國際及其國家安全的需要；其中，擴展民主體制、強化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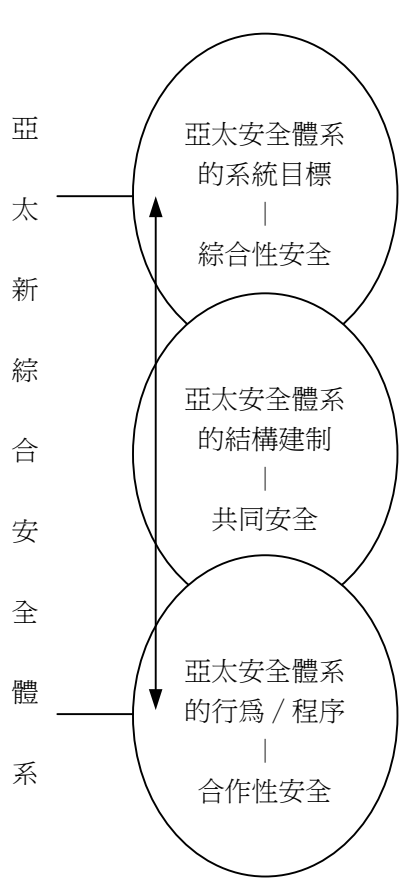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球反恐作戰及防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在「九一一事件」後更顯重要。因此，包括美國及東亞國家對安全概念的內涵，實應隨時勢所趨而擴大界定；亦即，從總體的戰略高度將全球化下經濟發展、政治與社會安定、政治民主化及軍事－反恐作戰及全球武器的控管皆統攝其中。這一統攝全球及亞太整體經濟發展、政治民主、軍事合作及滿足各國國家安全需要的新安全概念，既能提升東亞國家所期待「綜合性安全」的內涵，也更能落實美國等西方國家所強調的「合作性安全」與「共同安全」。對此一新的安全理念體系指涉，可名之爲「新綜合安全體系」（neo-comprehensive security system）來表意，請參圖 1：亞太安全理念體系的整合架構－「新綜合安全體系」所示。

雖然，在實體操作的層次裡，「綜合性安全」、「合作性安全」和「共同安全」的內涵因有些許重疊而難以全然區隔，但在概念層次裡，三者間的差異還是可以作更細緻的劃分，並將之整合成同一安全理念體系下不同層次的概念，以符合亞太地區獨特的安全環境與各國的安全需求。就安全概念整合的層次而言，可將強調多樣與整體性安全目標與內涵之「綜合性安全」界定爲亞太安全體系在「系統目標層次」的安全理念，突顯經濟、政治、軍事、社會、種族宗教與文化層面對國家與區域安全的重要性與意義。其次，比較注重特定安全形式、組織與制度安排的「共同安全」，則界定爲亞太安全體系在「結構－體制層次」的建構，以實現共同解決安全問題的理念，例如，可仿歐安組織成立「亞洲安全暨合作組織」或強化「東協區域論壇」組織建構與實踐都是未來重要的發展方向。最後，相對重視從各種可能之交流、協商、程序和過程增強各國進行安全合作的「合作性安全」，則可界定在亞太安全體系的「行爲－程序層次」，作爲促進國家與區域安全目標實現的程序、方法與措施，如「第二軌」的外交協商模式、建立「信心暨安全措施」及預防外交機制等。然而，不可否認地，當前部分東亞國家討論「綜合性安全」的內涵，仍太偏重於「非軍事」層面及注重東亞國家的國內政治與社會需求，而這也使「綜合性安全」對以美國爲主之西方國家較不具吸引與說服力；不過，這種情況在「東亞金融危機」、「九一一事件」後因政治民主化、反恐作戰需要已漸有轉變，這也意味「新綜合安全體系」的倡議與建構在全球化的趨勢下更具可能性。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1　亞太安全理念體系的整合架構：「新綜合安全體系」示意圖



	傳統的安全理念	全球化衝擊的影響
亞太安全體系的系統目標／綜合性安全	**傳統目標** 經濟成長、政治穩定社會安定、種族和諧文化並容、區域自主性和平（東協模式）…	**新增目標** 經濟全球化、政治民主化、反恐合作與防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
亞太安全體系的結構建制／共同安全	**結構建制** 傳統的區域安全保障機制、實施區域信心暨安全措施、裁軍與軍備管制等危機預防的安全保障體制…	**新增建制** 建立區域的經濟、金融與社會安全網絡與機制及促進民主化與反恐合作的機制…
亞太安全體系的行爲／程序／合作性安全	**行為／程序** 因無共同敵人故各國皆須爲安全負責，以各種可能的彈性及程序將正式與非正式機制都整合進區域安保體系，逐步建構讓各方互信合作的安保體系…	**新增行為／程序** 協調及整合全球及區域的安全機制，並擴及相關行爲者，包括被歧視國及非國家行爲者，更開放地設定區域安全的議程及彈性調整安全機制…

說明：↕表示這三個層次彼此間是貫通關聯互動的關係。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對深受全球化各種複雜因素牽制的亞太安全體系及各國對安全的新需求，「新綜合安全體系」不僅從總體戰略層次整合全球化下的經濟發展與風險監控、政治民主化、軍事－反恐合作及防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的安全意涵；而且，也從概念上提供各國透過實際利益的融合與交換而增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進安全合作可能，特別是，有利於亞太從全球性的反恐合作、防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及「鞏固第三波民主化」的戰略高點，增進亞太各國的安全合作。當然，「新綜合安全體系」的內涵若能爲亞太國家所採用及逐步落實，那身處亞太地緣戰略結構重要「中介」地位的臺灣，相對也較容易找到進入亞太安全體系的機會。這讓亞太各國得以依「新綜合安全體系」的建構順勢處理臺海兩岸的潛在的衝突，而不須一再地被中國所侷促。因此，臺灣應積極善乘「後東亞金融危機」及「後九一一事件」的國際安全趨勢，透過積極詮釋及發揚「新綜合安全體系」的內涵，突顯臺灣在當前與未來全球及亞太安全合作體制建構中的重要性；其中，尤其具意義的是，強調臺灣在地緣政治及地緣經濟發展之外，「政治民主化」進展－「鞏固第三波民主化」及全球反恐合作中對全球、亞太及各國安全保障的正面貢獻及意義。

伍、結　語

隨著冷戰的結束，一九九〇年代盛起的全球化風潮和相關的分析與探討，幾乎已成爲分析國際政經事務與全球性議題的新顯學。在眾多相關論述中，尤其是支持全球化的論述更是沿用新自由主義的觀點，宣稱全球化時代的正式到來，人類生活就將進入一個與過去完全「斷裂」（break）年代。事實上，這是一個「斷裂」與「延續」（continuities）並存的年代；亦即，所謂的全球化確實因新資訊與交通科技進展與普及，而讓人類生活出現一些過去未曾有的現象、感受與影響，但也非完全脫離過往社會生活的本質與內涵。就如同 Anthony Giddens 所論，全球化其實只是現代性（modernity）及其衍生的制度，包括資本主義、工業主義及民族國家被擴大延伸至被建構起的「全球」時空中（Giddens, 1990）。

基本上，這種「延續」與「斷裂」的看法與論爭都各有特定的指涉與啓發，而人類世界卻是在非常綿密與複雜的動態體系中持續地運轉，所謂「延續」與「斷裂」的現象往往是相互糾結、拉扯與辯證地互動及綿延著，實在很難以一刀切的論述及指陳來尋求解答，更無法將「延續」與「斷裂」預設爲對立的兩個本體進行論辯。但不可否認，以資訊科技爲主而出現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新經濟確實因新生產工具、生產型態、經營策略、方法及民眾消費模式的不同，而使得以往與市場經濟相關體系的運轉模式及內容，即生產關係、企業經營策略、政府與企業關係、相關法規與權力關係，甚至是人民的生活型態、經社關係的互動模式、內容和文化內涵都將隨之調整（Castells, 2000）。換言之，如何在「懷疑論者」所堅持「延續」國際化的基礎上掌握「有意義的轉變」－「斷裂」，才能迴避「延續」說者的不足及避免陷入支持全球化者所持「斷裂說」的武斷，更不須流於在形上層次訓詁「延續」與「斷裂」的窠臼。

本文主要目的即在透過省思全球化論述及全球化的進程，廓清支持全球化論述中，爲滿足其論證而呈現特定主張的偏差與不足；尤其是，在其先「抽空」時空差異性再建構全球「即時－同時」性論述中，明顯忽略包括地緣空間差異性、全球霸權及安全考量在全球化過程中的重要與關鍵性。從歷史的變遷來看，夾雜在全球化與區域化並行且交錯發展的軍事與經濟力量，一直是影響國際政經體系發展的主軸；也就是，當下的全球化也必然反映在亞太區域安全理念及體系的變遷中，其中，因資本全球化而產生之一九九七年的「東亞金融危機」，以及因二〇〇一年「九一一事件」而衍生之全球性反恐作戰，皆對亞太安全體系的發展造成深遠的影響。連帶地，長期主導亞太安全理論的主要理念－「共同性安全」、「合作性安全」與「綜合性安全」當然也應予重新檢視，評估這些概念在新「全球化」趨勢下的適用性及可能的修正，甚至，提出新的安全理念及理論以適應因全球化進程所帶來的改變與影響。

當前研究亞太安全體系的文獻，大多是個別分析「東亞金融危機」（Ding, 1998；Park and Lee, 1999；Cheeseman, 1999）與「九一一事件」對亞太安全體系的影響，而較少見自更高的理論層次，抑或從涵蓋兩者意涵的分析觀點，探討此一發展趨勢在現實及理論上新增的意義。本文嘗試從鳥瞰的理論高度整合全球－區域－國家的總體層次，分析全球化過程中所引爆「東亞金融危機」與「九一一事件」對亞太安全體系及理念的衝擊、影響及意義。經過整理分析後，本文也嘗試提出「新綜合安全體系」的理念，企圖在現有亞太安全理念的基礎上，順應全球化趨勢將經濟全球化與風險、政治民主化、軍事－反恐合作及防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等面向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統攝成適用於亞太地區的安全新理念，並以體系的觀點分將不同層次與性質的議題立體地整合成新的安全理念；更重要的是，這一「新綜合安全體系」的理念，也較「共同安全」、「合作性安全」及「綜合性安全」等傳統的亞太安全理念，更能彰顯臺灣在經濟發展、政治民主化及軍事－反恐合作上，對亞太區域和平穩定與繁榮的重要與貢獻。

參考書目

一、中文部分

中國時報，2000/11/26，版 3。

李文志，1996，〈亞太安全體系發展與台灣的策略分析〉，收錄於蕭全政等合著《劇變中的亞太與兩岸關係》，台北：業強出版社，頁 29-90。

李文志，1997，《後冷戰時代的美國亞太戰略：從扇形戰略到新太平洋共同體》，台北：憬藝出版公司。

李文志，2002，〈杭亭頓的戰略思想與美國全球戰略的關係〉，《問題與研究》，41(4): 1-20。

林正義，1996，〈亞太安全保障的新體系〉，《問題與研究》，35(12): 1-18。

林正義，1998，《東南亞區域安全體系的研究：理論與實際》，臺北：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

張惠玲，2000，〈亞洲金融危機對中共區域霸權目標之影響〉，《問題與研究》，39(2): 51-65。

張雅君，1998，〈中共與美、日的亞太海權競爭：潛在衝突與制度性競爭機制〉，《中國大陸研究》，41(5): 5-19。

陳鴻瑜，2000，〈中共倡組區域組織，衝擊東亞政經生態〉，中國時報，11/26，版 15。

劉復國，1999，〈綜合性安全與國家安全：亞太安全概念適用性之檢討〉，《問題與研究》，38(2): 21-3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蕭全政等合著，1994，《亞太經濟合作與台灣角色之研究》，台北：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編印。

蕭全政等合著，1996，《劇變中的亞太與兩岸關係》，台北：業強出版社。

蕭全政、李文志，1999，〈第二軌外交的內涵及對臺灣的意義〉，《政治科學論叢》，10: 383-402。

蕭全政，2001，〈東亞『區域主義』的發展與臺灣的角色〉，《政治科學論叢》，14: 201-222。

二、英文部分

Acharya, Amitav. 2003. *Regionalism and Multilateralism: Essays on Cooperatiove Security in the Asia-Pacific*.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Anderson, Benedict R. 1991. *Imagined Community: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Verso Books.

Appadurai, Aujun. 1990. "Disjuncture and Difference in the Global Cultural Economy." In *Global Culture: Nationalism,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 ed. M. Featherstone. London: Sage, 295-310.

Baker, James III. 1991. "America in Asia: Emerging Architecture for a Pacific community." *Foreign Affairs* 70(5): 1-18.

Baviera, Aileen S.P. 2004.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U.S. Foreign Policy and Great Power Relations in the Asia Pacific." In *Before and After September 11, 2001: An Asian Perspective*. Manila: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Ateneo Center for Asian Studies, 21-42.

Beck, Ulrich 著，孫治本譯，2000，《全球化危機》，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譯自 *Was Ist Globalisierung*? Suhrkamp: Verlag. 1996.

Castells, Manuel. 2000. *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Volume I. II. III.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Cheeseman, Graeme. 1999. "Asian-Pacific security discourse in the wake of the Asian economic crisis." *The Pacific Review* 12(3): 333-35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Christopher, Warren. 1993. “Christopher Calls for NAFTA-APEC-GATT Round ‘triple play’.” AIT Wireless File, EPF-411. Taipei.

Clinton, Bill. 1993. “I’m Sending a Message of Asia’s Importance.” AIT Wireless File, EPF-205. Taipei.

Corbett, Jenny and David Vines. 1999. “Asian Currency and Financial Crisis: Lessons from Vulnerability, Crisis and Collapse.” *The World Economy* 22(2): 155-177.

Dewitt, David B. 1993. “Concept of Security for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Common Security, Cooperative Security, Comprehensive Security.” Paper presented at Seventh Asia-Pacific Roundtable: Confidence Building and Conflict Reduction in the Pacific, 6-9 June, Kuala Lumpur.

Ding, Kuisong. 1998. “Asian Economic Crisis: Its Political and Security Implications in Asia Northeast Asia.” A Preliminary Draft Prepared For The 4th CSCAP NPWG Meeting, November 8-10, Beijing, China.

Evans, Paul M. 1995. “Multilateral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Meanings and Prospect.” Paper presented at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sia－Pacific Collective Security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April 12-14, Taipei: the Institute for National Policy Research and the International School on Disarmament and Research on Conflicts.

Evans, Peter. 1997. “The Eclipse of the State？ Reflections on Stateness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 *World Politics* 50 (October): 62-87.

Fisher, R. 1991. “Why Asian Is Not Ready for Arms Control.” Asian Studies Center, Backgrounder, May 25,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Funabashi, Yoichi. 1995. *Asia Pacific Fusion: Japan's Role in APEC*.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Giddens Anthony. 1990.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abito, Cielito F. 2004. “Beyond the Bloodshed: Terrorism’s Toll on Asian Economies.” In *Before and After September 11, 2001: An Asian Perspective*. Manila: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Ateneo Center for Asian Studies, 96-106.

Harrison, S.S. and C.V. Prestowitz. 1990. “Pacific Agenda: Defense or Economics.” *Foreign Policy* 79 (Summer): 56-76.

Hernandez, Carolina G. 1995. “ASEAN Post-Cold War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Asia-Pacific.” Paper presented at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sia－Pacific Collective Security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April 12-14, Taipei: The Institute for National Policy Research and The International School on Disarmament and Research on Conflicts.

Higgott, Richard. 199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lobalization in East Asia: the salience of ‘region building’.” In *Globalisation and the Asia-Pacific: Contested Territories,* ed. Kris Olds *et al*. New York: Routledge, 91-106.

Hirst, Paul and Grahame Thompson 著，朱道凱譯，2002，《全球化迷思》，台北：群學出版公司。譯自 *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Possibilities of Governan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9.

Hoffman, F. G. 2002. *Homeland Security: A Competitive Strategies Approach*. Center For Defense Information. Washington D.C.

Hoogvelt, Ankie. 2001. *Globalization and the Postcolonial World: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 Baltimore, Marylan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Huntington, Samuel P. 1991.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Huntington, Samuel P. 1993.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72(3): 22-49.

Huntington, Samuel P. 1995. “Democracy for the Long Haul.” Paper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presented at Conference Paper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nsolidating the Third Wave Democracies, Taipei: INPR &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Huntington, Samuel P. 1996.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Keohane, Robert O. & Joseph S. Nye. 1977.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Kudrle, Robert T. 1999. "Three Types of Globalization: Communication, Market, and Direct." In *Globalization and Global Governance*, ed. Raimo Vayrynen.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3-23.

Lake, Anthony. 1993. "From Containment To Enlargement." AIT Backgrounder Series: BG-93-16. Taipei.

Lake, David A. and Patrick M. Morgan. 1997. *Regional Orders: Building Security in a New World*. Penn State Press.

Lee, Lai To. 2001. "China's Relations with ASEAN: Partners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Pacifica Review* 13(1): 61-71.

Nash, Kate 著，林庭瑤譯，2004，《全球化、政治與權力》，台北：韋伯文化。譯自 *Contemporary Political Sociology: Globalization, Politics, and Power*.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9.

Nye, Joseph S. 1990. "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 80: 153-171.

Ohmae, Kenichi. 1990. *The Borderless World: Power and Strategy in the Interlinked Economy*. New York: Harper.

Olds, Kris *et al*. 1999. *Globalisation and the Asia-Pacific: Contested Territories*. New York: Routledge.

Park, Kun Young and Wang Hwi Lee. 1999. "The Financial Crisis of 1997-1998 and Its Impact on Security Relations in East Asia." *ASIAN PERSPECTIVE* 23(3): 129-151.

Payne, Anthony. 2000. "Globalization and Modes of Regionalist Governance." In *Debating Governance: Authority, Steering, and Democracy*, ed. Jon Pier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01-218.

Pierre, Jon. 2000. *Debating Governance: Authority, Steering, and Democra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ortes, R. and D.A. Vines. 1998. "European Integratio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In *Europe, East Asia and APEC: a shared global agenda*?, eds. P. Drysdale and D.A. Vin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73-101.

Rosenau, James and Ernst-Otto Czempiel. edited. 1998. *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osenberger, Leif Roderick. 1997. "Southeast Asia's Currency Crisis: A Diagnosis and Prescriptio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19(3): 223-251.

Smith, Michael Peter. 1995. "The Disappearances of World Cities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Local Politics." In *World Cities in a World-System*, eds. Paul L. Knox and Peter J. Taylo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49-266.

Solidum, Estrella D. 2003. *The Politics of ASEAN: An Introduction to Southeast Asian Regionalism*.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Solidum, Estrella D.1999. *ASEAN Engagement for Peace*. Manila: De La Salle University: Yuchengco Center for East Asia.

Stubbs, Richard. 2002. "ASEAN PLUS THREE." *Asian Survey* 42(3): 440-456.

Sum, Ngai-Ling. 1999. "Rethinking Globalisation: Re-articulating the spatial scale and temporal horizons of trans-border spaces." In *Globalisation and the Asia-Pacific: Contested Territories,* ed. Kris Olds. *et al*. New York: Routledge, 129-145.

Väyrynen, Raimo.1999. "Norms, Compliance, and Enforcement in Global Governance." In *Globalization and Global Governance*, ed. Raimo Vayrynen.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3-2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Vodanovich, Ivanica. 1997. “Comprehensive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An Ambiguous Relationship.” In *No Better Alternative: Towards Comprehensive Security and Cooperative Security in the Asia-Pacific*, ed. David Dickens. Victoria University (Wellington):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Chapter II.

Wallerstein, Immanuel. 2001. “Globalization or the Age of Transition?: A Longterm View of the Trajectory of the World-System.” *Asian Perspective* 24: 25-26.

Wallerstein, Immanuel 著，彭淮棟譯，2002，《自由主義之後》，台北：聯經出版社。譯自 *After Liberalism*.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5.

Waltz, Kenneth N. 1979.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ass.: Addison Wesley.

Went, Robert 著，萬毓澤譯，2002，《全球化：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台北：連結雜誌社。譯自 *Globalization: Neoliberal Challenge, Radical Response* (IIRE). PLUTO PRESS. 2000.

Yuen, Foong Khong. 1997. “ASEAN and the Southeast Asian Security Complex.” In *Regional Orders: Building Security in a New World*, ed. Lake, David A. and Patrick M. Morgan. Penn State Press, 318-339.

Zysman, J. 1996. “The Myth of a ‘Global’ Economy: Enduring National Foundations and Emerging Regional Realities.” *New Political Economy* 1: 157-18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Globalization Impetus to Asia-Pacific Security Ideas: A Theoretical Endeavor

Wen-Chih Lee*

Abstract

Since the 1990s, Globalization has been the main dynamics influe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 system. The trends of globalization were also reflected in the change of the Asia-Pacific security systems. Among them, the "East-Asia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911 terrorist attacks" both do deeply influence the development of Asia-Pacific security systems. Such situations make these conventional ideas like Common Security, Cooperative Security and Comprehensive Security defective. Even though these three concepts have long been discussed inside the issues of Asia-Pacific security systems, they should be regenerated to accommodate new challenges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The article first reveals how the trends of globalization condition the development of Asia-Pacific security systems and then argues that the new integrative idea "Neo-Comprehensive Security System" would be a better guideline on the security issues for countries around Asia-Pacific.

Key words: Globalization, Regionalization, Common Security, Cooperative Security, Comprehensive Security, East-Asia Financial Crisis, 911 Terrorist Attacks, Neo-Comprehensive Security System.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CHI-NAN Universit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